

中国翻译史博士论文研究分析 (2000—2021):问题与思考

欧阳东峰¹ 穆雷² 陈金怡³

(1. 广东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3. 广东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23)

摘要: 翻译史博士论文是翻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通过对 20 年来中国翻译史博士论文(2000—2021)的定性和定量研究, 考察这些博士论文涵盖的研究主题、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分析当中体现的问题意识、辩证意识、创新意识以及方法论意识, 阐述历时变化和特征, 探究其中存在的问题, 以期促进学界对翻译史研究现状和研究意识的思考, 推动翻译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 翻译史研究; 博士论文; 研究现状; 研究意识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3)02-0150-09

0 引言

古语云:“考之行事, 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只有了解和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模式, 才能准确地把握现在, 科学地展望未来, 翻译史研究聚焦学科自身的发展史, 关照历史上人类翻译活动之体相, 揭示因果相续之连环, 是翻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穆雷, 2021:227)。翻译史博士论文是翻译史的研究之成果, 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对 2000—2021 年研究翻译史的 281 篇博士论文进行系统梳理, 文献来源于 CNKI、维普数据库和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等, 呈现了这 20 来年里翻译史博士论文的情况和发展动向,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现状, 总结规律, 探讨对策。

1 2000—2021 年翻译史博士论文分析

翻译学研究涵盖翻译行为和译文的研究, 以及针对翻译研究之研究, 前者细分为纯翻译研究(含理论翻译研究、描写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含译者培训、翻译工具、翻译批评), 后者则为翻译之元研究(Holmes, 2007:67-80)。翻译史研究虽然没有在霍姆斯的翻译学构想里有适当的位置, 但它是基于翻译学基础, 具备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和研究视角的分支研究。翻译史研究可划分为两

收稿日期:2022-12-25

基金项目: 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高端科技翻译人才培养研究”(MTIJZW202116)、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五四时期广东红色翻译家研究(1902—1930)”(2022GZGJ229)、广东工业大学本科教学工程项目“新文科视野下广东工业大学省级一流翻译本科专业建设探索”(广工大教字 202259 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欧阳东峰, 女,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

穆雷, 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翻译教育和语言服务研究。

陈金怡, 女, 广东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辅导员, 主要从事翻译研究。

引用格式: 欧阳东峰, 穆雷, 陈金怡. 中国翻译史博士论文研究分析(2000—2021):问题与思考[J]. 外国语文, 2023(2):150-158.

大类:一为针对翻译行为及译文的研究,二为针对翻译史研究的研究。前者细分为五类:要素(译者史、译著史、译本影响史、译论史等)、媒介(笔译史、口译史、机器辅助翻译史)、题材(文学、宗教、技术、政治、新闻、商业等)、时空(通史、断代史、全球史、区域史)、方向(顺向翻译史、逆向翻译史)、符号(语际翻译史、语内翻译史、符际翻译史);后者则分为翻译史研究史和元翻译史研究(郑穹,2020:33-34)。

本文关注以翻译史为研究对象的翻译学博士论文,所涉及的主题以特定历史时期里与翻译相关的事件、人物、思想、文献、会议、机构、语种等进行界定,即译事史、译者史、译著史、译本影响史、译论史等。本文收集的翻译史博论共 281 篇,来自两岸四地 50 多所高校。数据表明,翻译史研究博论数量在过去 20 来年里有较大变化,从 2000 年仅为四篇,后逐步增长,在 2012 年达到了峰值 36 篇。另外,在 2008—2011 年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中,有三篇翻译史研究论文入选:《翻译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影响——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和接受》和《“中学西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1735—1911)——以英语世界为中心》,充分体现了翻译史研究的实力。20 年来翻译史博论成果颇丰,为了更好地对其进行分析,下面从研究主题、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三方面展开。

1.1 基于研究主题的分析

翻译史博论研究涉及的主题呈现多元态势,本文收集的博论按研究主题可划分为译事、译者、译论以及综述类研究,具体可分为时期研究、地域研究、人物研究、作品研究、专题研究、思想研究、运动研究、语种研究、机构研究等。在 20 来年里翻译史博论的研究主题中,作品研究占比最高,共 108 篇,接近总数四成,其余依次为人物研究,58 篇,占比五分之一;时期研究和专题研究,分别为 37 篇和 30 篇,分别占比 13.2%和 10.7%;思想研究 26 篇,占比 9.3%;运动研究八篇,占比 2.8%,语种研究七篇,占比 2.5%,以及地域研究和机构研究分别为五篇和两篇。具体统计表如下:

表 1 2000—2021 年翻译史博士论文研究主题统计表

研究主题	作品研究	人物研究	时期研究	专题研究	思想研究	运动研究	语种研究	地域研究	机构研究
论文数量	108	58	37	30	26	8	7	5	2
占比	38.4%	20.6%	13.2%	10.7%	9.3%	2.8%	2.5%	1.8%	0.7%

1.1.1 译事研究

译事研究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内容包含翻译作品、翻译运动、翻译地域、翻译语种、翻译机构等,研究者以新的背景、视角和方法分析翻译作品,探索翻译运动以及译事中所涉及的地域、语种和出版机构等话题。如基于历史背景、发展阶段、成果作品和评价反思,运用学科综合知识和研究方法,围绕李提摩太的西学著译进行研究,重现这段中西文化交流史(张涌,2016)。再如以《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和《译林》三家翻译文学的主流期刊为研究对象,从译介学理论出发,对外国文学引入与中国文学系统内部需求之间的关联和受制因素进行分析,阐释新时期以来翻译文学期刊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中国文学系统产生的影响(卢志宏,2011)。译事研究的史料经典性须以研究角度的理论时代性为观照,才能不脱离历史背景,不局限孤论译事(耿智等,2020:132-140)。

1.1.2 译者研究和译论研究

译者译论研究包括人物研究和思想研究。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译者,因为只有包括译者

在内的人才能承担社会因果的责任,只有通过研究译者及译者的社会关系(客户、赞助人、读者)才能理解翻译为何会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间和地点发生(Pym, 1998: xxiii-xxiv)。从2000年到2021年,翻译史博论涉及传教士研究13篇、林纾研究10篇、鲁迅研究9篇,此外,特别关注的有严复、林语堂、朱生豪、梁实秋、周瘦鹃、吴宓以及一些汉学家等。在译者研究中,研究者一般以译者生平为切入点,考察翻译经历和个人活动,深入分析译作,再从译作反拨译者思想轨迹和翻译风格。如《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结合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论述其翻译思想和价值取向,拓宽了翻译家的研究视野(孙吉娟,2020)。翻译史研究中的译者研究结合译者翻译活动的个人特点和译者行为的时代脉络进行考察和评价,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译界“译史研究,以人为本”的理念。

译者研究强调人的主体性,译论研究重视理论的客观性,突出其在历史演变中的形成、发展、变迁以及用于描写和解释翻译活动的适用范围和启示意义。如《西奥·赫曼斯翻译理论研究》一文阐释了赫曼斯的主要翻译理论创见,建构其理论体系,如等值批判理论体系、翻译规范理论体系、社会系统理论体系等,通过译论史研究界定赫曼斯翻译理论的体系内容(刘宏,2020)。鉴于翻译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跨学科视野是翻译史研究的天然属性和必备条件,因此,从只关注译史活动独立发展的内部史研究到涉及社会文化进程的外部史研究,从重在逻辑推演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到重在事物共性规律的自然科学理论都会对翻译史研究提供启发(穆雷等,2015:115-122)。

1.1.3 综述类研究

综述类研究包括专题研究和时期研究,专题研究是指针对某一主题的深入研究,如《系统中的戏剧翻译——以1977—2010年英美戏剧汉译为例》将英美戏剧汉译为专题,以多元系统论和文学操控论为理论框架,研究制约因素、操控改写和对译入语文化的建构作用(温年芳,2012)。时期研究则以年份或阶段性时间为梳理线索,进行翻译实践活动的成果综述,在全面系统整理史料的同时,加以深入的理解和思考,总结观点。20年来翻译史博论主要研究了清末民初、延安时期、五四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新时期等具有代表性的时间阶段。如《翻译相异性——1910—1920年〈小说月报〉对“异域”的表述》以文化“他者”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表述为核心问题,探讨中国新文化孕育成型时期各种中外文化因素相互渗透的复杂态势(吴燕,2006)。专题研究和时期研究有可能产生重叠,探究某一个专题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所有成果和共同特征,揭示内在规律。

在综述类研究中,综是述的基础,述是综的目的,综而不述是无观点的事实,只述不综是无依据的结论。综述类文章梳理总结,评价前人的研究成果,考察当前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和发展前景,融入研究者的批判性思考,考验归纳分析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并成为后续研究的起点。

在选题方面,翻译史博论反映出研究者非常重视译家译事译论研究,角度多元,方法多样,大大拓宽了翻译史研究的领域。但随着翻译史研究主题的深入,对研究者在史料的搜集、鉴别和选择上的要求愈加严格。“凡以言史料所从出也。然此种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明敏的方法以搜集之,则不能得。又真赝错出,非经谨严之抉择,不能甄别适当。此皆更需要有相当的技术焉。”(梁启超,1998:69)中西翻译史发展悠久,史料众多,如何针对研究主题钩沉史料,辨析甄别,有效取舍,是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的保证。在史料的挖掘、收集和整理上,一方面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精准说明研究主题的越好;另一方面,“断章取义地引用史料是一种极常见的毛病”(严耕望,1998:35)。须紧密结合历史文化语境,用三角验证法或多重证据法分析评价,达到观点的一致性。深化翻译史研究,

选题至关重要,研究者应当尊重史实,着眼当下,结合学科的时代发展趋势,保持研究的严谨性,选取适当的研究主题,推动翻译史研究向前发展。

1.2 基于研究视角的分析

“(翻译史)这一多学科、多元性的研究模式,使这一学科在20世纪下半期不仅成为外语研究者、翻译学学者驰骋的领地,还使一批比较文学、科学史和文化史学者的深度参与,成为翻译史界研究的常态。”(邹振环,2017:381)在281篇翻译史博论里,特别是近十年来,研究者采用的学科视角除了翻译学和历史学这两门源学科之外,伦理学、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阐释学、符号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操纵论、美学、精神分析学、后殖民等多元理论视角凸显了翻译史研究的跨学科性。如《跨文化传播学视角下的〈孙子兵法〉英译研究》按时期展现不同译本的文化特点和历史地位,考察《孙子兵法》译本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接受和变形的轨迹(吴莎,2012)。再如以《谈天》底本 *Outlines of Astronomy* 以及不同时期的译本作为一手史料,从概念厘清、翻译方法、译名废立等层面对史料进行耙梳钩沉,进而探究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刘晗,2021)。此外,有研究者以“场域”“惯习”“资本”等社会学概念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许敏,2018)。这些研究者的跨学科意识都给翻译史研究带来了丰富多元的理论视角。翻译史博论理论视角的发展与期刊文章基本保持一致,如《“人史”抑或“文史”——论中国翻译史研究的社会学视角》,该文章以社会学为理论视角,与翻译史研究进行有机结合,融会贯通,得出先人后文、以人为本的翻译史治史理念(欧阳凤,2021:105-114)。翻译史博论与翻译史期刊文章趋同的理论视角体现了翻译史研究鲜明的学科需求和多元的研究视野。

翻译史研究是动态开放、兼收并蓄的,各种理论资源都可能进入翻译研究者的视野。翻译史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决定了翻译史研究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学科依附性,翻译史研究应当成为翻译学中最具跨学科迁移能力的一个学科分支(屈文生,2018:830-836)。与此同时,在进行学科理论借鉴的同时,研究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和基于翻译研究问题导向的思路,才能回归翻译学科,进行有的放矢的研究。

1.3 基于研究方法的分析

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除了需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系统的学科理论之外,还需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金立鑫,2007:7)。纵观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虽然可以根据实践将方法论进行划分,但是按照不同研究目的划分的研究模式彼此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而常以共存的方法存在于同一个研究项目中(穆雷,2011:3)。正可谓史无定法,在一篇翻译史研究论文中,研究方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法共存。

翻译史博论运用的方法可以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和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进行分类,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具体为个案研究、语料库、调查法、历史档案研究等,人文主义研究方法主要为理论论证法、文献分析法、归纳演绎法等。在281篇翻译史博论中,个案研究约占一半,使用频率非常高,另外由于近年来对翻译技术的引进,语料库工具使用逐渐增加,研究者以史料为基础,进行描述性、解释性和探索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解决翻译史的研究问题。

如《翻译与现代汉语白话文的发展——基于历时复合语料库的研究》以现代汉语白话文为语料,利用语料库工具呈现翻译与现代白话文的发展历程(赵秋荣,2013)。该文将现代汉语白话文进行语料库数据归类,再分析规律,推导出研究结果。语料库分析的显著特点是快捷高效,增强

数据分析的客观性,使论证更具说服力,它除了用于语块研究,还可用于揭示有规律的语言特征,展现译文风格或译者风格。除此之外,语料库方法和其他实证研究法如抽样、访谈、问卷调查等以及人文主义研究方法相结合,能够充分利用材料,拓宽研究者思路,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研究》穷尽性统计了1978年至2007年从国外引进并翻译出版的图书书目,并综合性运用研究方法,从共时和历时层面探讨社会运行机制和翻译人才培养问题(魏清光,2012)。对比博论,翻译史期刊论文的研究也不仅局限于传统研究方法,如《近十年我国口述史研究现状——基于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一文,采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方法,研究口述史论文的年度分布、引文情况、期刊分布、作者分布、机构分布和研究热点等(唐恒等,2019:80-86)。这一现代信息技术创新能够形象直观地呈现研究数据,发现研究问题,为翻译史研究者带来了方法运用上的创新与启示。

此外据统计,产出翻译史博士论文的院校专业涵盖翻译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德国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亚非语言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宗教学、政治学、外国哲学、法律史、教育史、文艺学、藏学等,其中翻译学博导数量从原来20余所院校约30位增加到了如今53所院校160位,这些发展变化为翻译史博士论文的视角多维和方法多元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但翻译学博士生若要做到“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严耕望,1998:35),需要克服知识结构先天不足的困难,注重史学方法及其他相关学科方法的训练和积累,整合学科资源,发现问题,解释现象,注重史料搜集的科学性、理论认识的全面性、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和研究过程的可重复性。

1.4 问题与思考

首先,翻译史博论选题呈现一定程度的倾向性,如数据所示,“作品研究”主题的研究频率较高,相对而言,“地域研究”和“机构研究”较少。研究者可在“作品研究”这一主流基础上,拓宽主题选择范围,以思想、地域、机构、运动等为研究对象,考察翻译现象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关系,解决翻译学问题;其次,翻译史研究的多元理论视角凸显其跨学科性,为拓宽翻译研究的视野,超越外语学科背景研究的局限性,深入学习理解新理论仍必不可少,研究者须拓宽视角,以严谨的态度进行理论学习与研究,理论应用及其创新应紧密结合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找到研究切入点,避免套用和误用理论。再者,在翻译史博论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创新意识逐渐增强,在人文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加大了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运用,但其中有些文章研究方法仍然陈旧单一,因此,研究者在研究过程当中须根据研究对象,借助多种工具,处理数据信息,通过综合运用和系统分析,提高研究的灵活度,更全面地解释现象,说明问题。

总之,翻译史博论研究在选题、视角和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发展空间,研究者当秉持严谨治学的态度寻求突破和创新,发展新的学术生长点。

2 2000—2021年翻译史博论研究意识分析

以上数据显示,翻译史博论在研究主题、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不断突破创新,其中蕴含的研究意识如问题意识、辩证意识、创新意识和方法论意识充分体现了研究者的学术素养,有助于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把握事物规律,科学处理问题。

2.1 问题意识

问题是做学问的原动力,问题意识也是学者的基本素质(冯全功等,2018:104-111)。提出问题的能力是学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研究问题来自对历史的叩问、对现实的观照、对阅读的思考、与同行的论辩等,是生发出有学术性、延续性和拓展性选题的保障。提出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可以明晰研究者的思路,寻找潜在的研究主题,提高研究的可行性,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从可能性推导出确定性的过程,善于发问、敢于发问决定了研究的起点和高度,它不是指随意地没有依据地发问,而是针对具体史料,理清历史脉络,结合文化语境,敏锐地提出有逻辑性和代表性的问题。

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根据地的翻译活动研究——以布迪厄资本理论为视角》一文当中,研究者提出了延安翻译活动与延安抗战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为延安政权构建形象并取得法理性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体现延安在生死存亡时刻的领导力和创新力以及为延安政权生成战斗力的机制等?该文围绕以上问题展开,不仅合理运用了布迪厄资本理论中四个主要子资本概念(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而且说明了这四个子资本与场域之间的内在关系,对资本理论进行了很好的解读和补充,同时通过翻译史料体现了翻译活动及其产品在具体社会活动中的作用机制(王祥兵,2015)。研究发问表明了研究者鲜明的问题立场和批判意识,为后续的研究假设和论证开展打下基础。近年来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日益明确,一方面是学术规范和学术使命的要求,另一方面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的保证。正如许钧指出,做研究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的研究应该正本溯源,应该根据什么样的翻译问题,根据手中有怎样的材料,再去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许钧,2019:1-11)。

在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中,研究问题并非多多益善,以2~4个精准到位且逻辑严密的问题为宜。学位论文的研究问题跟一般的问题不同,“是什么”“有多少”“在哪里”等这类问题往往不能作为合适的学位论文的研究问题。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翻译活动翻译现象,研究者看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思考了什么?是否可以回答或者反驳已有的翻译史问题或结论?是否可以归纳提炼出对于认识翻译现象或推进翻译理论有作用有意义的内容?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博士学位论文的高度和深度。

2.2 辩证意识

辩证意识与问题意识相辅相成,辩证意识有利于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认清事物本质,进而用正确的思维方法开展研究。不同时期的学者对翻译史的认识和见解各有不同,这是因为历史“是一个随时代意识流动的变动体,今之非昨犹后之非今,且见仁见智,我之所是人未必是,人之所非我未必非”(熊笃,1994:70-74+80)。与历史对话,审视历史,从“史实”推演到“史识”,就是要在现有的研究中,在社会进程和历史背景下,找到正确的逻辑和顺序,提出“新”思考,从辩证思考中拓展,从史实中得出见解,因此辩证地认识翻译史是顺利研究的基础。20年来翻译史博士论文研究表明研究者的辩证意识普遍提升,研究者持严谨的态度在史料收集中不一味认同前人的研究,不绝对化判断史料,关注相互作用的系统联系,注重逻辑关联和论证的层层推进,在辩证考察译史现象的基础上集成论点,“辨”“证”结合,以“辨”生“证”,由“证”明“辨”,形成一个思考、扬弃的上升过程。

如《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以《红楼梦》百年间的英译史和译介史为研究重点,分析《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程,对其翻译、传播、影响与接受进行了描述和辩证思考,发现英美学术圈对霍译本的接受和认可程度远超杨译本,进而探讨了《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体系

中的地位和对中国文学外译的启发(江帆,2007)。考辨史料不仅要求我们对现有研究考证纠偏,更是对翻译史叙述在体例上不因过往建立起的主流权威叙事框架而有所桎梏,进而寻求突破,借以建立更客观的历史图景(许明武等,2021:105-112)。该博士论文以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全面梳理并深入分析了《红楼梦》翻译脉络及形象定位,没有人云亦云,大胆质疑前人观点,以事实为依据系统完整地再现了此历程,有效推动了研究发展。

2.3 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问题意识和辩证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从研究主题、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一方面或多方面寻求突破。翻译史作为一门跨学科研究,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是实现学科融合创新的重要切入点。此外,第一手研究材料的获取也是创新的重要来源,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傅斯年,2011:1),认为史料的挖掘和应用是推动史学进步的首要因素,可见史料在史学中的分量。如《浮出翻译史地表——性别视角下新时期以来英美女作家作品翻译研究》以英美女作家小说的译本为研究材料,考量了在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性别因素如何影响翻译活动(李红玉,2009),材料新颖,视角独特,充分体现出翻译史博论中史料创新的意义,凸显了研究者的创新意识。

翻译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具备天然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翻译史博论作者多为翻译学、文学或语言学专业,因此研究者更有必要开拓思路,灵活应变,多接触新学科新事物,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翻译研究的本体,培养积极求异、发散变通的创新性思维。

然而,需要正确理解“创新”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创新,这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既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进,又可以“无中生有”,创造发明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东西;而人文社会科学很难凭空生造,博士学位论文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别出心裁地编出一些概念、术语、论点、模式等等,不针对任何问题,不解决任何问题,天马行空,自说自话。翻译史博士学位论文里的创新,应该体现在充分了解和认识前人的翻译实践、翻译事件、翻译现象或翻译理论等基础上,找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再通过新数据、新方法、新视角等,阐释和论证尚未认知或者认知不到位的现象,推进人们对译事译者译论等的了解与认识,体现论文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

2.4 方法论意识

方法论是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手段、技巧、工具和途径的集合。它是学者进入一个研究领域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也是一门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蓝红军,2019:前言)。方法论研究的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从发现问题到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方法的有效性决定了研究的可行性,研究方法适当与否取决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把握是否贴切。方法论意识应该贯穿研究始终,研究者如何树立正确的方法论意识,选择最为适合的研究方法,是翻译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以《“译者登场”——英若诚戏剧翻译系统研究》为例,该文选取英若诚戏剧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进行了戏剧文体学分析、戏剧艺术分析以及译本对比研究,对英若诚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进行多维度的系统考察(任晓霏,2009)。研究者采取了宏观和微观、定性和定量、横向和纵向互为结合的系统范式研究方法,通过自建语料,采集平行语料和可比语料,分析各项文本指标如指示语、话语标志语或整体风格等,考察译本如何满足目的语观众的审美需求,达到了文学文本和舞台表现的双重要求。这一实证研究方法增强了研究的信度,实现了研究的高效性及

科学性。可见,方法论意识可以促进方法认知,推动科研进程,提高研究效率,成为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学术利器。

研究者的问题意识、辩证意识、创新意识和方法论意识紧密关联,互为促进,培养这四种意识是提升科研能力,体现学术价值,保障科学论证,产生优质成果的重要途径,促使翻译史研究更加科学规范。

3 结语

知史而后兴,勤思以致远。虽然翻译史博论中还存在如部分史料提取偏主观、对使用理论认识不全面以及一些论文批判意识不够明显等问题,但21世纪以来,中国翻译史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研究队伍,都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翻译史研究博士论文呈现出以下特点:研究对象集中在20世纪的译者和译事论述,占据六成以上比例;研究视角在本学科即译学理论的基础上,向外发散延展,呈现出翻译史研究独特的交叉学科特性;研究方法多元结合,呈现出翻译史研究日益科学化和实证化的趋势。

“对翻译的研究,如同对文化的研究,需要复调(plurality of voices)。”(Bassnett et al., 2001: 138)同样,翻译史研究也是多种学术生态体共存的领域,如何在这种纷繁芜杂中正确辨别、选择、思考并解决翻译史问题成为研究的关键所在。反观近20年来的翻译史研究博士论文,还应注意以下问题:选择史料时辩证筛选,遵循合理精准的原则;采用适当的理论视角,找到科学的切入点;善于利用各种研究方法,借助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发展成果为翻译史研究寻求突破;增强自身研究意识,坚持严谨、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从翻译史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维度上明晰学科定位,探索未来道路,推动译史研究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 2001.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G] // Bassnett, Susan.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e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Holmes, James Stratton. 2007.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G] // Holmes, James Stratton.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67-80.
- Pym, Anthony. 1998.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冯全功, 许钧. 2018. 青年学者如何做翻译研究——许钧教授访谈录[J]. 中国外语(4): 104-111.
- 傅斯年. 2011. 史学方法导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耿智, 李亚舒 等. 2020. 翻译家刘重德先生译学思想考释[J]. 外国语文(1): 132-140.
- 江帆. 2007. 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 金立鑫. 2007. 语言研究方法导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蓝红军. 2019. 译学方法论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李红玉. 2009. 浮出翻译史地表——性别视角下新时期以来英美女作家作品翻译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 梁启超. 1998. 中国历史研究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刘晗. 2021. 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 刘宏. 2020. 西奥·赫曼斯翻译理论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 卢志宏. 2011. 新时期以来翻译文学期刊译介研究——基于对《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和《译林》的分析[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 穆雷. 2011. 翻译研究方法概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穆雷, 欧阳东峰. 2015. 史学研究方法对翻译史研究的阐释作用[J]. 外国语文(3): 115-122.
- 穆雷. 2021. 翻译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欧阳凤. 2021. “人史”抑或“文史”——论中国翻译史研究的社会学视角[J]. 翻译界(1): 105-114.
- 屈文生. 2018. 翻译史研究的面向与方法[J]. 外语教学与研究(6): 830-836.
- 任晓霏. 2009. “译者登场”——英若诚戏剧翻译系统研究[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 孙吉娟. 2020. 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上海:上海大学.
- 唐恒, 戚筠. 2019. 近十年我国口述史研究现状——基于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J]. 图书情报研究(3): 80-86.
- 王祥兵. 2015.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根据地的翻译活动研究——以布迪厄资本理论为视角[D]. 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魏清光. 201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 温年芳. 2012. 系统中的戏剧翻译——以1977—2010年英美戏剧汉译为例[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 吴莎. 2012. 跨文化传播学视角下的《孙子兵法》英译研究[D]. 长沙:中南大学.
- 吴燕. 2006. 翻译相异性——1910—1920年《小说月报》对“异域”的表述[D]. 广州:暨南大学.
- 熊笃. 1994. 史意、史识、史学、史法——评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J]. 中国文学研究(1): 70-74+80.
- 许钧. 2019. 当下翻译研究的困惑与思考[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3): 1-11.
- 许敏. 2018. 中国现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1940-1949)——基于场域、惯习、资本的视角[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 许明武, 聂炜. 2021. “重写翻译史”: 缘起、路径与面向[J]. 外国语文(6): 105-112.
- 严耕望. 1998. 治史三书[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 张涌. 2016. 李提摩太的西学著译研究[D].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
- 赵秋荣. 2013. 翻译与现代汉语白话文的发展——基于历时复合语料库的研究[D]. 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
- 郑穹. 2020. 翻译史研究的名与实[J]. 文教资料(13): 33-34.
- 邹振环. 2017. 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M]. 上海:中西书局.

A Stud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in China (2000–2021)

OUYANG Dongfeng MU Lei CHEN Jinyi

Abstract: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translation histor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ranslation history studies. This article makes a survey on the research topics,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covered by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s through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2000-2021). It also discusses the consciousness of research questions, dialectical thinking, innovation and methodology in these papers. Based on these above,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diachronic change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so as to arouse academic awareness of the status quo and research consciousnes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for its advancement.

Key words: translation history studies; doctoral dissertations; research status; research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朱晓云